

张光直作品系列

Kw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国考古学

张光直作品系列

古代中国考古学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张光直 著 印 群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中国考古学 / (美) 张光直著；印群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1

(张光直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4338-2

I . ①古… II . ①张… ②印… III . ①考古学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 ① K87-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0475 号

责任编辑 饶淑荣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7.25

字 数 387千字 图347幅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65.00元

(印装查询：010 64002715；邮购查询：010 84010542)



在哈佛大学，80年代末期



与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19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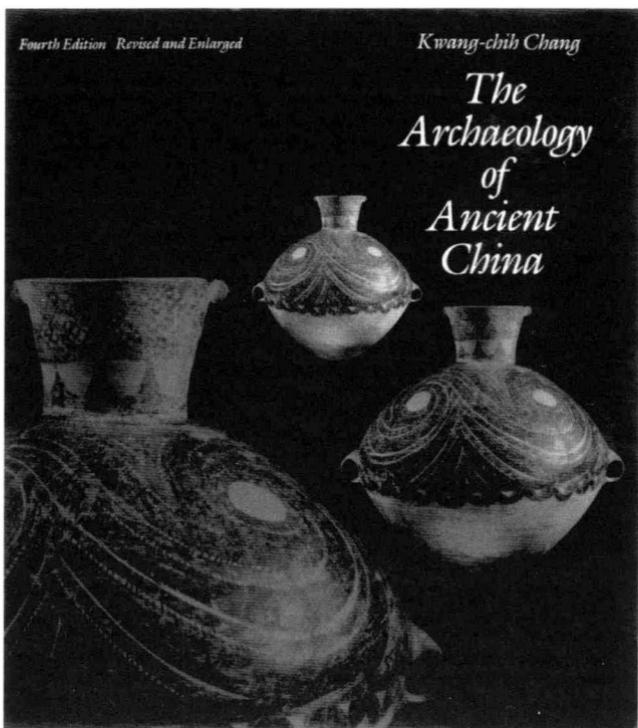


最后一次访问大陆，与张长寿（左）、冯浩璋考察商丘东周时期的
夯土城墙（宋城），1997年

Fourth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Kw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国考古学》英文版第四版，1986年

中文版自序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这本书已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先后出了四版，四版的年代是 1963、1968、1977 和 1986 年，这本中译本是根据 1986 年第四版翻译的。近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很快，新的材料层出不穷，一本根据当年的材料所作的对中国考古的综合研究，过不了几年便被新材料赶了过去，便需要作大幅度的修改。所以这四个版本实际上可以说是四本不同的书。第四版是 1985 年底完成的，到今天又快十年了。这十年来又出了许多新发现，按说又该写第五版了。但是我目前没有写第五版的计划。一方面是因为最近十年来考古期刊在地方上不断出新，我一个人已经没有办法将全国考古出版材料收齐。另一方面也由于第四版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构架在今天看来还没有作基本上修改的必要。把第四版作基础，再把十年来出土的新材料择其重要的在适当的位置上插入，这本书还可以使用一段时期。在这篇序里面，我便想试试看将一些新材料稍作介绍，看能不能将这本中译本所代表的时代向前推进一些。

说到这本书的中译本，这本书为什么一直是用英文写的，为什么到今天才有中文版，这些问题都反映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的一些特征。从 1949 年到 80 年代的初期，中国大陆的考古学

者与国外考古界几乎没有接触，西方考古界在这几十年中在理论、方法、技术各方面重要的发明与发展，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可说是非常微小的。这些年中新发现的资料越来越多，可是对它们的研究和解释的方法，仍然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阶段，以用年代学（基于地层学和类型学）和古史分期（基于马恩的唯物史观）作框架来排比材料为主要的作业目标。在 1962 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书，综合建国十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这种方法作出来的文章和报告，在史前史和古史的发展变迁的程序和动力上，很少有新颖的见解，但在材料的提供上，是比较客观的。所以这三十多年中的考古期刊与报告，提供了大量的客观史料，这是中国考古界在政治挂帅的困境之下所作的积极贡献。

60 年代的初期，我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班毕业，写了一篇叫做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in China: A Study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60) 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所采取的基本方法论是 50 年代在美国盛行的所谓聚落形态的研究法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approach)，这种研究法把考古遗址当做聚落看，将聚落当做社群看。用这种方法来整理考古资料，主要的目的是将“物”在概念上转化成“人”。所以考古学的“资料”就转化成人类学的“现象”。以人类学的现象作研究的基本材料，我们便可以直接地分析文化差异与变迁的程序和因果关系。我在这篇论文里，便除了将考古材料分类排比以外，同时讨论了文化差异变迁的程序与因果关系。次年我便采用了论文的结论作为基本的框架将到 1961 年前后所有的中国考古资料作了一番整理，在 1963 年出版了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的第一版。这本书既是用西方的观点整理中国资料的一种尝试，它便成为全世界各区域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环

节，所以它也就一向是全世界各区域考古学的基本参考书之一，也便是它一直用英文写作的原因。从第一版到第四版，这本书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基本上就是一个：那不断陆续出土的新资料，迫使我们随时检讨我们的解释理论，随时迫使我们将它修改、完善。例如第一版的解释框架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中原核心说。可是到了第四版，由于中原以外区域资料的大幅增加和这些区域很多文化被碳素十四定年特早，我们很自然地改用了区域多元性的新诠释。

就在 80 年代的初期，由于一连串内外的因素，中国考古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产生重要程度不一的各种变化。1981 年的《文物》第 5 期发表的苏秉琦和殷玮璋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开始使中国考古学摆脱中原核心的窠臼，使区域考古和由之而来的许多文化演进交流等问题，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以后八九十年代中一连串的考古理论书籍、论文的出版和翻译，如张忠培的《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载《文物与考古论集》1986)，俞伟超主编的《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1989)，俞伟超和张爱冰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 6)，北大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举办的“走向二十一世纪——考古学的学习、思考与探索”座谈会(发言摘要载《文物天地》1988, 3)，南京博物院出版的《东南文化》中刊载的许多理论性的论文(如 1992 年第 2 期中的《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张忠培先生访谈录》和李科威的《考古类型学的进化观与文化动力学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院考古部编《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1991)，蒋祖棣、刘英译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的《时间与传统》(1991)，以及拙著《考古学专题六讲》(1986)等，90 年代的中国考古工作者可以说是在考古理论和方法论上感觉十

分饥渴的，因而在这种气氛与环境之下对于资料排比式的中国考古学的综合研究自然有不足之感。因为最近几年我出了几本中文书（除了上述的《六讲》以外，还有《中国青铜时代》一、二集），国内的读者对我的作品有一定程度的熟悉，所以对这本有长期历史的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便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我相信这本书的中译本所以在今天问世，是有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的。这本书包括的范围很广，处理的问题非常复杂，里面一定有许多错误和不妥之处，我希望国内的读者不吝指正。

上面已经说过，本书的第四版出版于 1986 年，它所使用的考古材料的出版年代到 1985 年底为止。自 1986 年到今天（1993 年），考古出版品中又积累了七八年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照我的意见还没有影响到全书的结构，但在很多点和面上使我们对个别文化的了解，要丰富了许多。下面依原书的章目为序，将比较重要的新材料略作讨论。

（一）旧石器时代的基础

这几年来新出土和新发表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又有多处，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四川巫山（黄万波、方其仁等著《巫山猿人遗址》，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和山东沂源（《人类学报》1989，4）两处的猿人化石。

古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自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的发现（1929）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不论在材料的数量上还是它们的重要性上，都已达到不能不为世界上讨论人类演化史者加以郑重考虑的程度（见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中国远古人类》，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最近世界古人类学者两次

座谈现代人类出现的理论问题（T.Akazawa, K.Aoki, T.Kimura, eds., *The Evolution and Dispersal of Modern Humans in Asia*, Hokusein-sha, 1992; R.W.Sussman, guest editor, “Contemporary Issues Forum: A Current Controversy in Human Evolu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95, No.1, 1993），在很多关键性的争论上，中国人类化石材料与研究都被学者举出来作为讨论的根据。

（二）早期农民（8000 B.C.—5000 B.C.）

全新世初期从旧石器的渔猎采集时代向新石器农耕时代的转变，还需要考古学家与许多自然科学家的进一步的研究，但近几年来在华北、华南都出了一些新材料。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较重要的新发现，集中在长江中游两处。其一是湖南北部的澧水流域（见《考古》1986, 1、5; 1989, 10），尤以澧县彭头山最为重要，其年代可早到公元前6000年以前，出土绳纹、刻纹的陶器和大量的稻米，是中国现知最早的稻米发现（见《文物》1990, 8）。比彭头山稍晚为石门皂市，再下去便接上下一个阶段的大溪文化。另一处是湖北西南部枝城市（原宜都县）的几处遗址，以城背溪为主（见《江汉考古》1988, 6及1991, 1），也出有与澧水流域相似的绳纹、刻纹陶器。

华北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处。其一是河北省中部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见《考古》1992, 11）。这里出土遗物很少，只有陶片十五片、石骨角器四件和有人工凿孔痕木棒、木块各一件。陶片都是素面的，石器中有磨棒、磨盘各一件。同出的动物骨头里面，除了野生种类以外，有可能是家养的鸡、狗和猪。最重要的资料，是这个遗址的好几个碳素十四数据，都在距今一万年上下，是现有华北最早的一处

新石器时代遗址。华北发现另一处重要遗址，是河南省南部舞阳县的贾湖（见《华夏考古》1988，2及《文物》1989，1）。贾湖的遗物很像是裴李岗文化，但也有人主张应另立一个类型。贾湖的重要性在于它出土的器物所反映的这个时代的文化的丰富繁缛。它有制作精巧的骨器，包括一件多音阶的笛子。随葬物中有龟甲，上面刻有似是文字的符号。除此以外，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山东临淄、章丘一带新发现的后李文化，似是比北辛文化为早，与裴李岗文化平行的一种新文化（《中国文物报》1992，6）。

在磁山文化以北，在年代上与磁山文化平行，但面貌与磁山文化迥异的一个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过去我们知道在所谓东蒙南满地区，即辽河和大凌河流域，在公元前5000年到前3000年之间，这个地区已知道有三组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富河文化在西，老哈河与西辽河的红山文化在中，辽河下游以沈阳为中心的新乐文化在东（见本书图138）。兴隆洼文化分布在红山文化区域，但远较红山文化为早，目前定年在公元前5500年以上，与本章的较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平行，是已知东蒙南满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的陶、石器与新乐、富河的相像，多是压印篦纹的平底棕褐色陶，但有它自己的特征（见《考古》1985,10；杨虎《试论兴隆洼文化及相关问题》，《考古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三) 华北新石器时代区域文化的发展(5000 B.C.—3000 B.C.)

中国考古学上研究史最久的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里面所知最丰富的文化；几年来新发现的资料使我们对仰韶文化的了解更为完整与多面（见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

京文物出版社，1989；巩启明《试论仰韶文化》，《史前研究》1983，1）。新发现的资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可能是有关宗教艺术的，这些资料综合看起来对仰韶文化中的巫术、巫师的性质和活动有明显的启示（见拙著《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4，64）。其中最为重要并为人注目的是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一个可能是巫师的墓葬。濮阳西水坡的仰韶文化遗址属于豫北的后岗类型，据碳素十四数据可早至公元前四千余年。遗址中有房基、墓葬和窖穴的遗存，但在这里要详细介绍的是南北一排的三组蚌壳堆成的美术图样。第一组在第45号墓葬：

墓主为一壮年男性，身长1.84米，仰身直脚葬，头南足北。……骨架的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摆塑龙虎图案。蚌壳龙图案摆于人骨架的右侧，头朝北，背朝西，身长1.78米、高0.67米。龙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虎图案位于人骨架的左侧，头朝北，背朝东，身长1.39米、高0.63米。虎头微低、圆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如行走状，形似下山之猛虎。……虎图案北部的蚌壳，形状为三角形……在这堆蚌壳的东面……还发现两根人的胫骨。（《文物》1988，3，3页）

第二组蚌图摆塑于M45南面20米处，……其图案有龙、虎、鹿和蜘蛛等。其龙头朝南，背朝北；其虎头朝北，面朝西，背朝东，龙虎蝉联为一体；其鹿卧于虎的背上，……蜘蛛摆塑于龙头的东面，头朝南，身子朝北。

第三组蚌图，发现于第二组……南面……约25米。……图案有人骑龙和虎等。……龙头朝东、背朝北、昂首、长头、

舒身、高足、背上骑有一人，也是用蚌壳摆成，两足骑在龙的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面部微侧，好像在回首观望。虎摆塑于龙的北面，头朝西，背朝南，仰首翘尾，四足微曲，鬃毛高竖，呈奔跑和腾飞状。……人骑龙和奔虎腾空而起，如在空中奔驰，则非常形象，非常壮观。（《考古》1989，12，1059页）

这三组蚌图的重要性，是将龙、虎、鹿等动物的美术形象与巫师密切地结合起来，将它们帮助巫师沟通鬼神上的作用，很明显地表示出来。看了这批材料后，我很快在《文物》1988年第11期写了一篇短文，引用了后世《抱朴子》和《三跖经》中道士与龙、虎、鹿的关系，来解释濮阳蚌图的意义，并指出这个“巫跖图像”的母题，在中国古代从仰韶文化一直延续到汉代。我这个看法，自然有我的偏见，因为这批材料有力地证实了我对三代青铜器上动物纹样的解释（见《中国青铜时代》1982）。

关于45号墓地布局，庞朴（《中国文化》1989，1）和冯时（《文物》1990，3）同时作了很有意义的新解释。因为巫师头朝南，他身左的虎在西，身右的龙在东，与后日四神中的龙虎的方位相同。巫师脚下的一组蚌壳和两根胫骨似乎象征北斗象，因此他们两位都将这座墓葬说成宇宙图，相信当时已有至少是雏形的二十八宿的观念。如果此说可信，那岂不是表示这个墓的布局正好象征巫师乘龙骑虎漫游宇宙？

除了仰韶文化以外，这个时期的北方地区中比较重要的新发现，是有关红山文化的。本书里已描述了东山嘴的礼制建筑与泥塑女像。规模更大，数量更多的礼制建筑（“女神庙”）和泥塑女像又在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发

现(《文物》1988,8)。牛河梁的遗迹主要包括女神庙和积石冢；女神庙内有彩绘墙壁画、泥塑人物与动物像的碎块和陶制祭器。在积石冢发掘的墓葬中发现许多玉器，有箍形器、猪龙形玉饰，环、璧、钩云形玉饰等等。这可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宗教性的一个遗址，同时它的艺术品，尤其玉器，也很值得注意。用玉和滑石雕塑的人像和各种鸟兽像还大量地发现于辽宁省东沟县的后洼遗址(《文物》1989, 12)。

(四) 华南新石器时代区域文化的发展(5000 B.C.—3000 B.C.)

近几年来整个长江流域都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尤其集中于湖北、湖南洞庭湖两岸及江西鄱阳湖沿岸。材料尤其丰富的是有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及江西和安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别值得提出一下的是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屈家岭文化的城址。这个有四个门、有护城河包围的圆形的城，定年于公元前2700年到前2000年，是中国最早的城址之一(《中国文物报》1992, 10)。形状不一的城址，据说在屈家岭文化中已发现了五处。

因为我对台湾考古的兴趣，我个人对东南海岸，尤其是福建沿海考古特别注意。新发现的遗址中从这个观点来看最为重要的是福建平潭岛上壳丘头遗址(《考古》1991, 7)。这里出土的陶器除了绳纹以外还有多数的贝壳压印纹，与过去金门出土的陶片相同，我目前把它当做大坌坑文化的一个类型(《考古》1989, 6)。

(五) 中国互相作用圈与文明基础

这章所讨论的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形成的“互相作用圈”(或称“互动圈”)和这个圈内各个区域文化因为互动与

互相影响而产生本质类似的平行变化和发展这些说法，经过这几年新材料的考验，不但证明了它基本的正确性，而且在很多细节上更加加强了。从公元前 3000 年开始，各区域的龙山文化不约而同地显示出许多共有的新现象，如城墙的建造、人祭人殉的使用、墓葬中大小规模的悬殊、专门制造的祭器和法器、似文字的符号和小件的铜器等等，都越来越明显地指出，各地的龙山文化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社会和文明出现的时代。南京博物院的车广锦将“仰韶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时期、红山文化后期、大溪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时期”称为“古国时代”（《东南文化》1988, 5），与上文所说的意思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这几年来各区龙山文化较重要的新发现，在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龙山时代有城墙的城址，本书所报告的在山东有一处——章丘的城子崖，在河南有三处——淮阳平粮台、安阳后冈和登封王城岗。最近数年来，山东的有围墙的城址又新发现了三处：寿光边线王、淄博桐林与邹平丁公（见《考古》1993, 4；《中国文物报》1993, 20）。就是在城子崖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龙山文化的城址，而原来的城址现在相信是属于晚于龙山的岳石文化的。这四个城址，从边线王到城子崖，自东向西一线，都在泰沂山地北侧平原地带，彼此相距 35 到 50 公里，很合乎古国的形象。河南有围墙的城址又增加两处，即郾城郝家台和辉县孟庄；孟庄的城墙长宽各 400 米，是河南龙山城址中最大的（见《中国文物报》1992, 47）。

突出表现了山东龙山文化社会统治阶层的崇高地位的考古新发现，是临朐县朱封村的两座大墓。两墓都是六七米长，一个是一棺一椁，一个是一棺两椁。都有多色彩绘和随葬的玉器和精美黑陶（《中国文物报》1990, 6）。重要性可能更大的是上述邹平丁公遗址中一片有十一个文字的陶片的新发现，这些